



Alain de Botton

中英双语插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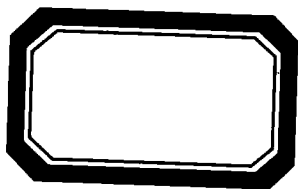
亲吻与诉说

Kiss and Tell

〔英〕阿兰·德波顿 著 刘云波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lain de Botton

中英双语插图本

亲吻与诉说

Kiss and Tell

〔英〕阿兰·德波顿 著 刘云波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吻与诉说:双语珍藏本/(英)德波顿(De Botton,
A.)著;刘云波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

书名原文:Kiss and Tell

ISBN 978-7-5327-5716-9

I. ①亲… II. ①德…②刘…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8281号

Alain de Botton

Kiss and Tell

Copyright © Alain de Botton 1996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ain de Botton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2-320号

亲吻与诉说

[英] 阿兰·德波顿 著 刘云波 译

责任编辑/王洁琼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75 插页 5 字数 294,000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5716-9/I·3376

定价:42.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 T:021-59226000



阿兰·德波顿 (Alain de Botton), 英伦才子型作家, 生于 1969 年, 毕业于剑桥大学, 现住伦敦。著有小说《爱情笔记》(1993)、《爱上浪漫》(1994)、《亲吻与诉说》(1995) 及散文作品《拥抱逝水年华》(1997)、《哲学的慰藉》(2000)、《旅行的艺术》(2002)、《身份的焦虑》(2004)、《幸福的建筑》(2007)、《工作颂歌》(2009)、《机场一周: 希思罗日记》(2009)。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

亲吻与诉说

[英]阿兰·德波顿 著

刘云波 译

* 关于书名的译法,需要作如下说明:kiss and tell 作为一条俗语,有“背弃诺言、泄漏秘密”之意,但此处显然也有字面的“亲吻与诉说”之意。考虑到本书的题材,编者还是决定以“亲吻与诉说”作为书名。

Alain de Botton was born in 1969. He graduated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He is the author of *Essays in Love* (1993), *The Romantic Movement* (1994), *Kiss and Tell* (1995), *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 (1997), *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 (2000), *The Art of Travel* (2002), *Status Anxiety* (2004), *The Architecture of Happiness* (2006), *The Pleasures and Sorrows of Work* (2009) and *A Week at the Airport: A Heathrow Diary* (2009). His work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wenty-five countries. He lives in London.

我的作品在中国

——新版文集总序

阿兰·德波顿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首度中国之行。抵达北京时是2004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的几位中国编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随身带着我所有作品的中文版。从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的编辑向我解释,对于将我的作品引进中国市场她真是既充满期待又有些担心。她说,要想让中国读者接受一个全新的欧洲作家的作品真的很难,除非是那些教你如何取得商业成功或是如何操作电脑软件的书。不过,我的中国编辑也充满信心。因为中国读书界自有一群严肃的读者,他们渴望读到内容深刻、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结果,我的中国之行就演变成一连串的图书推广活动:接受采访、在媒体上露面以及在书店里朗读和签售。虽说大家事先都有过各式各样的疑虑,不过好消息还是接踵而至:我的作品确实在中国卖出去了。《拥抱逝水年华》——一本描写以晦涩著称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书竟然卖了两万册!

写书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搞不懂为什么他的大著地球人没有人手一册;另一种人则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竟然有人肯巴

巴地花钱买他的书而且认真读过。我属于后一个阵营,所以对于我的书竟然能在中国赢得这么多读者,我深怀感激。我有个网站(www.alaindebotton.com),我每天都能看到中国读者的留言,他们想跟我交流几句,想表达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写作是桩难上加难的营生,可是拥有这么热心的中国读者,感觉确实容易了很多。

返观我已经出版的几本书,我有时仍不免有些犯嘀咕:我到底属于哪一类作家——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只言片语连缀到一起,成为一本完整的书。从一开始写作,我就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位。在明确知道我想成为哪一类作家之前我只知道我不可能成为哪一类作家。我知道我不是诗人,我也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我讲不来故事,我“发明”不了人物)。而且我知道我也做不来学者,因为我不想墨守那一整套学术规范。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自觉正好适合自己的定位:随笔作家。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随笔作家,就是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如果一位随笔作家来写一本有关爱的书,他也许会对爱的历史和心理稍作探究,不过他最终必须得用一种个人化的调子来写,使读者读起来就像跟朋友娓娓谈心。这种朋友般的阅读感受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我的书读起来就像跟朋友谈心,不想拿大学问的帽子来充门面、唬人。

初习写作,我还认识到我喜欢写得尽可能简单朴素。这当然也挺冒险的,因为虽说你是刻意写得朴素,可难免也会冒乏味和幼稚之讥。不过我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发现,要想附庸风雅、假充聪明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你只需故作高深,让人弄不懂你就成。如果有本书我看不懂,也许就意味着作者比我更聪明——这是我们作为读者都未能免俗的一种普遍的受虐欲心理。我则宁肯

抵挡住这种诱惑,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写作,因为我讨论的主题本身就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恋爱、旅行、身份焦虑、美与丑以及分离与死亡的经验等等。

除了要写让人看得懂的书之外,我还立志要写在某些方面能对人有所助益的书。有一种观念认为好书就不该(没义务)对人有任何用处,为艺术而艺术嘛——并非为了实际的进步或是事业的成功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种观念。为了完全改变自己而去啃那些严肃的书籍确实愚不可及,不过,我也认为,抱定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目的去读书,是至关重要的。最好的书能清楚地阐明你长久以来一直心有所感,却从来没办法明白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

恋爱和阅读之间或许真有某种重要的关联,两者提供的乐趣差堪比拟,我们感到的某种关联感或许就是基于这个根源。有些书跟我们交流的方式与我们的爱人同等热烈,而且更加诚实可靠。这些书能有效地防止我们因自觉并不完全属于人类大家族而滋生的伤感情绪:我们觉得孑然孤立,谁都不理解我们。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愠怒、我们的罪恶感——有时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于是油然而生。那位作者用确切的文字描述了一种我们原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所会心的情境,一时间,我们就像两个早早地去赴约吃饭的爱人,兴奋不已地发现两人间竟有这么多的共同点(陶醉之下,只能嚼几口眼前的开胃小食,哪有心思再去吃什么正餐),我们也会把书暂时放下,带点乖张地微笑着盯着书脊不放,仿佛在说,“何等幸运,邂逅此君。”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

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不过,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描绘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习见的那些情感和人物,好书对我们各种感情的描绘远胜过我们自己的体会,它处理的感知和认识虽确属我们所有,却又是我们根本无力予以明确表达的;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我读书时总抱着非常个人的理由:为了帮我更好地生活而读书。我十五六岁时开始认真地读书,当时最喜欢读的就是爱情故事。我把书中的人物都想象成我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活人;我读得如饥似渴,又感同身受。这足可以解释文学何以能够为失恋的人儿带来舒缓和慰藉。在文艺作品中认出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我们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这正是作家们为了创作而采取的立场。

学着读书——写作又何尝不是——也就等于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个性并非如我们乐于想象的那般密不透风,我们自以为只归我们独有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没那么私密——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客观超然的,像你在快餐店里招呼侍应生那么不带感情色彩,而是说它们其实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我们在发现自己并非如此孤立的同时也要付点代价:我们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与众不同。

我自己在读书时总是很自私:我不想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我读书是为了学习,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更有自知之明、更多才多艺的人。我几乎从来都不为了“取乐”而读书。

我希望这能有助于解释我为什么写了这些书——写这些书是期望它们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的处境。中国竟然也有些读者愿意跟随我探索的旅程,幸何如哉!

2008年10月于伦敦

(冯涛 译)

导 读

在模糊中探索人性

——阿兰·德波顿和他的《亲吻与诉说》

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家 汪洪章

以貌似传记的形式写小说,或以小说的笔法写传记,以至使小说与传记的写作界限模糊,并在这种模糊中探索人性,特别是探索普通人性,这要算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小说的一个通例。

小说得写人。这种近乎常识的小说观念也许老套了些,但即使在当代所谓后现代的文化写作语境里,要找一两本不写人的小说恐怕是困难的。写人、写人的情感和欲望、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写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的困难,并进而揭示人或滑稽或荒谬的种种生存状况,至少在将来较长的时间里仍将是小说写作回避不了的主题。与同样以写人为职志的传记相比,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小说出现较晚,即使从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算起,其整个历史也不过四百年。而西方的传记写作则源远流长,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初的普鲁塔克及其同时代的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前者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后者的《阿古利可拉传》,都曾对西方的散文、传记、戏剧以及史学著作产生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在西方,小说

虽然晚出,但它却也从传记写作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叙事技巧,早期西方小说的写人手法更是直接脱胎于传记。西方小说史上有个较为普遍而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小说都是以主人公命名的。《堂吉珂德》、《摩尔·弗兰德斯》、《汤姆·琼斯》、《高老头》、《包法利夫人》、《大卫·科波菲尔》、《德伯家的苔丝》,乃至《达洛威夫人》,都让人读来颇似传记。这在中国或近代或现代的小说中较为罕见。四大传奇小说中没有一部是直接以主人公来命名的。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用西方人比较注重彰显人性来加以解释。

写人并力图达到传记写作的真实,以使读者阅读时信以为真,这往往是西方早期小说家的共同追求。笛福的《鲁滨孙历险记》、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以及其后直至十九世纪的许多西方小说都是如此。这种为人性立传的冲动(biographical impulse)至今仍然左右着西方的小说家。当代英国的年轻小说家阿兰·德波顿就是这么一位。

德波顿 1969 年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在瑞士和英国长大。现任英国伦敦大学高级研究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是位典型的学者型作家。自 1993 年以来已出七部书。根据其第七部书《地位的焦虑》改编制作的三集记录片将于今年春季在英国电视台播出。除下面要介绍的《亲吻与诉说》外,德波顿比较热销的书还有两部。一部是他的第四本书《哲学的慰藉》(2000 年),另外一部是第六本书《旅行的艺术》(2002 年)。前者单单在英国就已经售出十五万册,而后者在欧洲和美国、澳大利亚已售出四十万册,这种销售业绩在近当代颇为挑剔的欧美读书界是不多见的。那么,德波顿的书里有什么东西竟能如此吸引并打动当代欧美读者呢?

西方传统文化,经过二十世纪种种现代、后现代思潮荡涤和洗礼,目前正面临着亟待整合重组的局面。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化

将以什么样的态势,再度使世人惊讶,恐怕是众多西方文化战略家和批评家们正在努力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型作家,德波顿对此问题决不会也不能置身其外。他在从容悠游于西方文史哲的同时,也在结合着他这一代人的生存现状,挖掘整合着西方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从而探索一种足以支撑当代西方人生存的精神基点。他的《哲学的慰藉》单在人口基数很小的英国就能卖到十五万册,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个小数目。根据此书改编制作的电视系列片《哲学:生活指南》后来又在英国电视四台播出。这些都说明,物质生活已很丰裕的西方人,在自己世俗的人生旅途中,仍然需要从自己文化祖先那里汲取营养以获得某种精神的东西来扶持自己。

《哲学的慰藉》选取处理了六位哲人——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塞内加、蒙田、叔本华和尼采。在这六位哲人中,有宁静内敛的智者,有世俗而讲求实际的生活导师,也有颇具诗人气质、勃发着生命意志冲动的强人、狂人。德波顿这种选择处理的方式很见用心。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士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一向讲求儒、佛、道的调剂互补。在德波顿的书中,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到这种调剂倾向呢?哲学家,特别是那些以所谓体系完美而著称的大哲学家,如黑格尔,往往会使普通人敬而远之,但在德波顿看来,真正的哲学不应远离普通人及其世俗的生活,而只关注弄清一些抽象的哲学定义;不应只是提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假设,而对于人们该如何生活得更好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不闻不问。作者是英国人,而二十世纪一些声名显赫的英国、美国的哲学大家,如罗素、怀特海、艾耶尔竟无一人能有缘入选该书。这或多或少透露了作者对二十世纪英美哲学的评判。罗素和怀特海都力图将抽象的思辨还原为数学,而艾耶尔则更是直接地认为哲学是个封闭的系统,它与现实生活无关。这样一来,他们的哲学大概就真的不能给人的生存以

慰藉了。难怪比较关注人类当下生存状况的德波顿要将他们排除在其《哲学的慰藉》之外。

《哲学的慰藉》中的六位智者都并不怎么热衷于打造什么抽象的哲学体系,但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毕其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人性,有的还能以自己的实际人生为例,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这样,当今众多的欧美读者能将目光投向这位如此年轻的学者所写的一部讲人生大问题的小书,也就不怎么令人奇怪了。

即使在行销四十万册的颇似导游手册的《旅行的艺术》中,德波顿也不忘写一些启迪人思又不乏抒情、调侃味道的美文。波德莱尔、华兹华斯、凡·高、罗斯金等人的名字常常出现于作者的笔端。可以说作者在写一本旅游书的同时,实际上也旨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人生的大旅途中,人们该如何生活得更幸福?

德波顿的小说往往与通常意义上的小说有一定的距离。它们都写得智性十足,充满对西方文、史、哲的议论,可说是熔文、史、哲于一炉而成就的一种新型的小说艺术。他已出版的七部书中,《亲吻与诉说》是少见的比较像小说的作品。

《亲吻与诉说》是他的第三部书,1995年出版,出版后受到欧美读书界广泛好评。当时作者只有二十六岁。该书实际上是以传记的形式写的小说,或者可以说是以小说的形式写的传记。在前者的意义上,该书遵循着西方小说写作的通例,只不过书并没有以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命名而已;而在后一意义上,该书又对西方历史久远的传记写作有所批评、挑战和探索,同时不乏对当代西方生活的洞见,很能引起普通人性的共鸣。

传统的西方传记一般都写伟人、名人,在大多数情况又都是死人,作者与传主既无一面之缘,那么传主肖像的描绘也就只能依靠传下来的一些硬邦邦的历史资料或传主所写的日记之类,乃至传

记作者道听途说来的轶闻了。如此写出的传记其真实性究竟如何；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迹近传主的真实生活，特别是其精神生活，这些就都成了一个一个问号。更有甚者，在这些传记里，普通生活中所存在的普遍人性掩而不彰，好像人类历史只是由为数不多的伟人、名人创造的。于是像恺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歌德、司汤达、巴尔扎克、玛丽莲·梦露、W·H·奥登这样的人物，就“顽强而贪心地攫取了传记的地盘”。

不满于这种传记写作的状况，德波顿试图从这块被攫取的传记地盘上划拨一部分给极普通的女子——伊莎贝尔。作者在反思传统传记写作的同时，也探讨着一种小说人物的新的写法，于是有了这部介乎于传记和小说之间的《亲吻与诉说》。

小说的缘起谈不上奇特。故事叙述人是位男子，曾经和一位名叫迪维娜的女子同居过六个月，后分手。一天，他收到迪维娜的一封信，指责他缺乏自我意识，同时又如此自我迷恋，说他以专横跋扈、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一切，而不关心别的任何东西。几周后，在一家书店里，他偶然翻到一本维特根斯坦的传记。在这本传记的护封中央部位，他读到该书一位批评家的如下一段话：“一个人很少会对另一个人如此感兴趣。传记作家中也很少有人对传记的主人公表示过如此同情。作者从心理、性、交际等各个角度审视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在此过程中再现了本世纪最复杂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叙述人“我”有感于这段话中的“同情”二字以及迪维娜的指责，突然意识到理解别人是个普通但复杂而又有趣的过程，意识到传统“传记关注的是非凡生命，它所掩盖的则是任何平凡生命的非凡之处”。在一种为普遍人性作传的冲动驱使下，“我”决心给下一个走进“我”生活的人写传，这个人就是“我”在一次晚会上结识的伊莎贝尔·简·罗杰斯，也就是《亲吻与诉说》女主人公。

“我”与伊莎贝尔相识后,开始约会,次数逐渐频繁。“我”就这样得以从最(亲)近的距离,“窥视”伊莎贝尔的日常生活行为的方方面面,倾听其不经意中吐露的对过往情事的回忆以及她对生活诸多面相的看法。在这过程中,“我”也不断修正着自己对传统传记写作的看法和批评。“写好人生也许和过好人生一样难,”作者在书的扉页上引用了利顿·斯特雷奇的这句名言,意图凸显理解人性、为人作传、而且是为自己亲近的活人作传之艰难,进而挑战、怀疑绝大多数传统传记描述传主生平的真实可靠性。

这部颇为怪异的小说其实正是身为传记哲学家及实践家的“我”以“同情”、移情的目光和理解力去打量揣测人性最深邃隐秘的部分。其结果实际上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女子形象。人性中本来既有伟大善良的一面,也有卑琐阴暗的一面。绝大多数传统的传记在给伟人、名人立传时,往往着意凸显前者而忽略后者,这大概是因为传记作者无法亲近传主,对传主的生活一无所知,或者是因为流传下来的材料比较缺乏,作者的想象力不够等原因所致。于是传主的形象往往大都大于生活。《亲吻与诉说》中的伊莎贝尔则不是这样。她以她的诉说和日常行为举止,在心理、性、人际交往、个人嗜好等方面所透露出的信息,因“我”自然流畅的叙述和细致入微的性格分析,着实能在读者面前活画出一个可触摸得到的形象。

这个二十几岁的女子在伦敦一家文具公司工作,任生产助理。在谈及自己自九岁起的性经历时,竟然能“像官员宣布选举结果”一样庄严地宣布道:“哦,我很可能和十七个人接过吻。至于上过床的,那就少多了,大概有九个或十个吧。”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对自己性经历的坦诚回忆和叙述,是会令耳朵比较稚嫩的我们这些东方人感到惊讶的。她的诉说所直接面对的听众——“我”,可以说是她的新结识的情人,而她竟能如此坦陈,这种诉说和倾听的关